

[文章编号]1009-3729(2011)05-0043-04

浙江出版业的历史考察

董强¹, 隗静秋²

(1.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2. 浙江万里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摘要]浙江出版业历史源远流长,其刊刻工艺发达,注重文教相习,有很多专门性的藏书与出版机构。从中唐时的官刻,到两宋时的私刻,及明清时的藏书阁、古籍考据、文献整理等,浙江出版业保存和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繁荣,推动了图书馆学与目录学的发展,形成了系统而富有特色的出版思想,对我国出版业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浙江出版业;藏书楼;图书刊刻学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志码]**A

浙江出版史不仅是两浙文化史的璀璨明珠,在我国出版史上也大放异彩。浙江出版业滥觞于中唐五代;两宋之际,浙江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业中心之一,与福建、四川鼎足而立;南宋时臻于巅峰,一度成为全国出版业的翘楚。浙江出版业在元代虽稍逊两宋时期,但以西湖书院为首的刻书业堪称奇葩。明代,浙江出版业人才辈出,风起云涌,藏书楼天一阁蜚声中外。清代的文化钳制使浙江出版业惨遭重创,但在浙东学派的熏陶下很快重启中兴局面。近代以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书籍的出版涌动钱塘大地,白话报与新式出版渐趋繁荣。西泠印社、嘉业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蜚声海内外的出版机构将民国浙江出版事业推至新的高度。本文拟在梳理浙江出版业历史的基础上,探讨其特点及影响。

一、百花竞逐的出版业盛况

浙江自古为人文渊薮。中唐时,两浙刻书业渐兴,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唐诗文学繁盛,私人刻书渐起勃兴。五代时,佛教文化兴盛,吴越君主笃

信佛教,广建寺院。钱俶委派净寺延寿和尚主持刻印《宝篋印陀罗尼经》等经卷、佛图,颁行各地。1917年,吴兴天宁寺经幢象鼻中就出土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篋印经八万四千卷”的题刻。1924年,杭州西湖雷峰塔坍塌时,从砖缝中发现公元975年钱氏刻印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等经卷,至今纸质洁白、字迹隽永。

两宋是浙江出版业的巅峰时代。北宋时全国五大刻书基地,首推浙江。宋廷为笼络江南名贤,邀集一批卓越的浙江籍学者参与《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的编撰,还在杭州刊印《资治通鉴》《太平御览》《七经正义》等卷帙浩繁的鸿篇巨著。浙江孕育了一批刻板、印刷的能工巧匠,刻印技术精湛。诸多朝廷钦定重要典籍,均由汴京送至杭州开雕,促进了浙江刊刻技术的发展。南宋时,宋室南渡,杭州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方名儒为躲避兵燹,隐逸江南,促使浙江出版业出现鼎盛局面;以杭州国子监为代表的官刻独领风骚,成为全国出版业的楷模;陈起、陈思父子的民间坊刻遍布临安

[收稿日期]2011-07-14

[基金项目]2009年浙江省社科联社科普及立项课题(SQ11001160)

[作者简介]董强(1984—),男,江西省南昌市人,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社会史与出版文化史。

市井小巷,推动了传统文化向民间的传播。南宋时,浙江刻书种类丰盈,传统的经、史巨著,文集、农书、医书、善书等一应俱全(见表1);刻书工艺熟稔精湛,字体隽秀,刀法圆润,版式工整,脉络清晰,堪称“书之奇品”。用字方面,南宋喜好欧体。欧体字瘦劲秀,字形略长,转折笔画细棱有角,是浙刻的一大特色。用墨方面,南宋刊刻用墨质量较高,以“墨色香淡”见长。装帧方面亦是匠心独具、美仑美奂。

表1 南宋时期浙江刊刻的主要书籍

出版者	主要出版物
国子监	《十三经》《史记》《淳熙礼部韵略》《说文解字》《尔雅疏》《国语解》《刑统》《唐文艺志》《资治通鉴》《白虎通德论》
皇家内府	《隶韵》《春秋经传集解》《混成集》《绍兴校定本草》《脉经》
浙东路公使库	《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通鉴释例》《稽古录》《兰亭考》《太玄经》《事类赋》《外台秘要方》《苕溪渔隐丛话》
浙西路公使库	《易数钩隐图》《中兴馆阁书目》《中兴百官题名》《活民书》《寿国脉书》《临川先生文集》《龟溪集》《伐檀集》《作邑自箴》

元代浙江囿于战乱与政治因素影响,刻书业稍逊南宋。西湖书院的藏版与刻书,使得浙江刻书业位居全国前列,尤以《元文类》《玉海》为代表。元后期,涌现王应麟等浙东四明世家学派,他们在文学、史学上造诣极深,在图书编纂与刊刻方面亦堪居魁首。浙江闻名的常山纸、上虞纸,绍兴出产的蜡笺、黄笺、花笺等,都是元代刊刻的必备原料。元代宫廷诸多诏诰文书均送至浙江刊印。优良的刊刻技能是元代浙江出版业发展的基石。浙江的刻工技艺超群,普遍具有较高文化素养,不少工匠还亲自参与图书编辑。薪火相承的精湛工艺使浙江刊刻书籍之品位在全国独占鳌头。

与宋元时相比,明代浙江出版业在刊刻数量、影响与地位等方面都远逊于前代。朱元璋问鼎中原后,元代遗存于杭州西湖书院的20余万片书版尽数运抵南京,“吾浙宝藏俄空”,使得浙江出版业元气大伤。万历以降,浙江出版业渐露复苏迹象,湖州刻书业异军突起,尤以闵齐伋、凌濛初的彩色套印蔚为大观。以胡应麟为代表的浙籍学者一生笔

耕不辍,在文学、史学、藏书、刻书方面成就斐然。他们积极投身图书刊刻活动,大力改进图书编目方法,对推动浙江刻书业发展功不可没。晚明浙江商业经济荣盛,市民阶层迅速崛起,一批市民文学及迎合市民阶层的出版物接踵而至,诸如“三言”“二拍”《古杂剧》《红拂记》等拟话本小说、长篇章回体小说、戏曲韵书等。杭州书肆林立,除固定的书坊外,流动书贩亦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湖州兴起一种“书船”,即一叶扁舟沿水路流动售书。“书船”的营销策略拓展了书籍的传播渠道,推动了出版市场的形成,加快了出版商业化的进程。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藏书家和有名的藏书楼。据统计,杭州有藏书家198人,湖州94人,绍兴93人,宁波88人,嘉兴75人,海宁67人。最有名的藏书楼当属宁波范钦修建的天一阁,在范钦去世时该楼藏书量达7万卷之多。^[1]两浙藏书规模最大的藏书楼——嘉业堂藏书楼,藏书18万余册,约60余万卷,在全国亦屈指可数。

清前期,受文字狱等文化钳制政策的影响,浙江出版业相对沉寂。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案迭起,这些钦案与浙江均有牵扯,尤以湖州“庄廷龙史书案”关涉最大。不仅直接参与编纂的学者惨遭杀戮,就连刻工、印工、装订工乃至读者均受株连,历史上也十分罕见。清中期,浙江谈书色变,对文化事业影响甚巨。乾嘉时,浙江的刻书业趋渐复兴。整个学界已由清初经世致用的学风逐渐转向考据与古籍整理领域,“谈古避今”的校讎、考据之学蔚然成风。乾嘉后,浙江私刻业发达,私刻书坊鳞次栉比。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浙东学者在继承发扬前人学术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频出新著。他们探究学术,广泛参与图书编纂与出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近代以降,西方文化思潮渐起,浙江出版业焕发生机。陆续涌现了浙江书局、西泠印社等新式图书出版机构,开创了颇具近代意义的图书馆,如古越楼、浙江省立图书馆等。在新式出版业中,张元济草创的商务印书馆与陆费逵、沈知方创办的中华书局影响卓著,杜亚泉、章锡琛对《东方杂志》的革新与发展亦堪称翘楚,鲁迅、郑振铎、胡愈之等学者则投身于近代报刊与杂志行业。图书的种类亦有增添。近代以前,图书品类集中在文学、史学、经

学、金石学等方面,品类单一,内容乏陈。近代以后,西学书籍的翻译与刊刻渐为潮流,除西方工艺与自然科学之作外,还大量关涉思想、文学、艺术、政治等。民国时,漫画家丰子恺首推漫画艺术创作与出版,世罕匹敌。白话报、白话小说无疑是这个时代最具特色的事物,有利济学堂报、算学报、译林、杭州白话报、浙江五日报、浙江潮、宁波白话报、湖州白话报、浙源汇报、浙江教育官报、越报、杭州商业杂志等诸多报刊出版。在出版家领域,近代以来的浙籍出版家可谓人才荟萃,刘承干、朱遂翔、张静庐、沈雁冰等文人不仅著述丰富,而且有出版行业的经历。西方机器印刷技术的引入推动了浙江刊刻技艺的革新,无论是刊刻工艺还是装帧品质,俱焕然一新。

二、浙江出版业的特点

其一,浙江出版业的历史源远流长,延脉不辍。浙江出版业滥觞于中唐,崛起于五代,兴盛于宋元,臻善于明清。随着雕版工艺的兴起,浙江出版业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全国刻书业的中心之一。两宋之际,浙江出版业步入鼎盛。上至官刻,下至坊刻、私刻、佛刻、道刻,一应俱全。1127年宋室南渡,杭州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刻书与藏书的发展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此后数百年间,出版家、藏书家人才济济。

其二,浙江出版业遍及全省,刊刻工艺发达。北宋时,国子监将卷帙浩繁的类书交付浙江刊刻。南宋时,得益于政治中心南移,国子监等中央文化机构纷纷迁至杭州,杭州遂成为全国重要的刻书基地。元代虽对南方采取相对歧视的民族政策,但元代的大部头巨著均一体交付西湖书院刊刻。浙江私刻繁盛,无论通衢大邑还是乡间僻野,均有刻书作坊,营销网点众多。浙江的刻书工匠刻法高超,不断革新刊刻技术。

其三,浙江出版业注重文教相习、触类旁通。刻书业本身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为推动刻书业的发展,出版家除刊刻图书外,还在日常活动中承担学术研究与书籍整理工作。浙江籍出版家在丰富图书刊刻的基础上开展了诸多与之相关的文化活动,产生了被《四库全书总目》评介为“宋末已为世所重”^[2]的《直斋书录解题》等不少经典杰作。

其四,浙江出版史上涌现出专门性的藏书与出版机构。藏书是图书刊刻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浙江是我国藏书家最多、藏书机构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据学者统计,仅藏书家一项,浙江历代藏书家就多达1062人,占全国藏书家总数的22%。^[3]除丰富的藏书外,浙江还有专门从事出版的机构,元代杭州的西湖书院就是较早兼图书编辑、图书整理、图书刊刻为一体的专门性研究机构。清同治六年(1867年)出现的浙江书局,是一个具有官方性质的专门性出版机构,1913年并入浙江图书馆,历时40余年。民国时的西泠印社、嘉业堂等出版机构不仅从事出版,还围绕经学、文学、史学、金石学等展开专门的学术交流,推动了浙江文化的兴盛。

三、浙江出版业的影响

浙江出版业对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中唐时的官刻,到两宋时的私刻,及明清的藏书阁、古籍考据、文献整理等,对我国传统文化事业的承续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保存并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从历史脉络看,浙江出版种类繁多,不仅有经、史、文诰等,亦刊刻有文集、小说、医学、名物等诸多门类。

遗存至今的五万余首唐诗中,浙江出版做出了杰出贡献。中唐时,绍兴刊刻有白居易和元稹的诗集。陈起父子在刊刻唐人诗集方面声名大噪。据王国维考证,传承至今的有《常建诗集》等17种,“陈宅书籍铺所刊唐人诗集其存于今日者止此,然当时所刊实不可胜计。……今日所传明刊十行十八字本唐人专集、总集,大抵皆出陈宅书铺本也。”^[4]既往所刊多以专集出版为主,汇辑本尚无,海盐人胡震亨所撰《唐音统签》填补了空白。

话本小说也是出版的主要种类。嘉靖年间藏书家洪梗所刊《清平山堂话本》就是我国话本小说中最早的刊本。此话本原有60篇,保存了宋、元、明以来的话本小说资料,对开创明清小说时代具有重要意义。脍炙人口的《白蛇传》就源于话本小说《西湖三塔记》。

第二,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繁荣。浙东学派在浙江出版史上具有显著地位。浙东学派肇始于王应麟。王应麟是元代著名出版家,他奠定了浙东学派的基础。明代以降,浙江涌现了王阳明、王畿、钱德

洪、徐爱等不少学者,促进了浙江出版业的发展。清代时,浙东学派臻于鼎盛,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廷采、邵晋涵等学者均为浙江乃至全国著名的出版家与藏书家。

第三,推动了图书馆学与目录学的发展。在刻书与藏书过程中,许多学者开始探索更具学术价值的编撰与检索方法。南宋人陈振孙早年就留心收藏图书,为官期间大量购置书籍。他在兴化(今福建莆田)担任通判时,收购了精良的闽刻宋版书。陈振孙还对图书进行了细心的蒐集与整理。他在担任国子监司业时编纂有《直斋书录解题》。《直斋书录解题》原本为56卷,现行本为22卷,全书按照四部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共辑入图书多达51 180卷。陈振孙并非单纯编纂图书,他在编纂《直斋书录解题》时,对所录之书都一一注明卷帙,详加评论,首创了目录学中的解题体裁。

明代绍兴人祁承燾是著名的藏书家。他对淡生堂藏书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在《庚申整书小记》和《庚申整书略例四则》中记述了他对图书编目分类的见解。在《庚申整书略例四则》中,他提出“因、益、通、互”四字分类原则,充分展现了他在图书编纂方面的思想。^[5]所谓“因”,乃因袭传统四部分类法。他认为“部有类,类有目,若丝之引绪,若网之就纲,井然有序,杂而不紊”。他赞赏西晋荀勖《中经新簿》的四部分类法,以为“历代分类之法,多则丛聚而易淆,寡者又寂寥而易失”。所谓“益”,“非益四部之所本无也”,将“似经似子无间,亦史亦玄之语,类无可入,则不得不设一目以汇收”。所谓“通”,即“流通于四部之内”。所谓“互”,即“互见于四部之中也”。祁承燾的这些编目分类见解在图书馆学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编纂的《淡生堂书目》采用表格式著录,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编排。为便于检索,他采用分析著录与互见著录相叠的方

法,对同书而卷册版本有所不同的以“又”字另著一条,对上下正续的编著则分条著录。其目成后,续收各书,则续录于各类末尾。

在图书分类上,明代学者胡应麟注重分类体系的创新,自创了书籍的分类方法,他在前人四部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五部分类法。他主张在经、史、子、集四大类之外,应该将别录中佛道二藏、贗古书、类书归为一部,附于四大部之末。

第四,形成了系统而富有特色的出版思想。在编纂思想上,注重图书编纂思维的创新,对出版物的质量十分考究。南宋绍兴年间浙东茶盐司刊印的《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周礼疏》等经书,以及绍熙年间黄唐刊刻的《礼记正义》《毛诗正义》等,历经几代人心血,直到庆元年间沈作宾刊刻《春秋正义》为止,才使经疏合为一本。在编排形式上,强调精于校勘,注重出版物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清代浙东学派将治学的严谨风格贯穿于图书的编纂与校勘,字字珠玑,校对精细。在出版质量上,注重刊刻技术革新。明代湖州闵齐伋、凌濛初在朱墨两色套印的基础上,发明了三色、四色、五色等彩色套印法。浙江的刻书家还十分讲究用纸、用墨与书写的圆润与否,故而浙江的出版物质量上乘,桂冠群雄。

[参 考 文 献]

- [1] 缪咏禾. 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343.
- [2] 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Z]. 北京:中华书局,1964:1132.
- [3] 顾志兴. 浙江藏书史[M].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序言.
- [4] 王国维. 两浙古刊本考[M].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 [5] 李希泌,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C]. 北京:中华书局,1982:28-30.